

# 日戰犯悔罪

# 淚謝中國寬大

■權德源在家中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回憶起審判庭長賈潛宣讀判決書的時刻，精神振奮。  
記者于珈琳攝



## 親歷者憶瀋陽正義審判：「這是國人揚眉吐氣時刻」

### 紀念九一八事變85周年

今年是九一八事變85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正義審判日本戰犯60周年。隨着遼寧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恢復審判庭舊址、尋找親歷者的進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被了解。1937年，在瀋陽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56年，新中國審判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則被認為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結束。這3年，84歲的權德源已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的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他右手拄着拐杖，蹣跚着走過醒目的朱紅色門柱，在門廊裡「正義審判」的大牌匾旁端詳良久，對此他百看不厭，

「這四個字我印象深刻。」60年前，權德源作為特別軍事法庭的書記員（類似法官助理），親歷了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7月1日開始的第二階段審判，「這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刻，是正義審判邪惡！」牙齒已有些脫落的老人，字句鏗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1956年第一批被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釋放。圖為當年釋放大會場景。  
翻拍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片



「那是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國干預，審判了36名日本戰犯。」退休前任遼寧省司法管理幹部學院民法經濟法教研室的權德源保持着慣有的嚴謹，說明了重要的歷史意義——這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國際戰犯的審判。

### 遵照國際法庭模式 溥儀首個出庭作證

1955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的權德源，被分配到中央政法幹校的東北分校任教員。1956年懂日語、懂法律的他入選剛組建的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工作組，負責庭審記錄、把錄音編成文字材料等工作。1956年7月1日上午8時30分，瀋陽審判進入審判庭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的第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賈潛宣佈開庭。

「賈庭長的一舉一動嚴格按照國際法庭的規定，開庭模式也是遵照東京審判的方式。」接受採訪時坐在家中沙發上的權德源說着也不自覺地挺起腰板，「庭審前，賈庭長就宣佈在庭審中被告可以向證人發問，除律師辯護外，被告可以自己辯護，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也是意料之中的，「是事實」、「完全屬實」、「完全真實」成為這些日本戰犯在證人控訴作證後的認罪悔過。

「審判程序很嚴謹，公訴人起訴、法庭調查、證人作證、法庭辯論、被告提問、辯護人辯護、被告陳述，最後宣讀判決書。」而最令他難忘的是7月1日開庭後的第一個受審被告人、時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審判長讓公訴人讀起訴狀，起訴日本侵略者從瘋狂到滅亡過程中的罪行。」而此時出庭的第一位證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細高的個子，長脖子，戴黑框眼鏡，穿一套犯人穿的深藍色囚服。」至今，權德源還記得庭上溥儀說的第一句話：「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漢奸愛新覺羅·溥儀。」

1956年7月20日宣判，藤田茂等8名日本軍隊戰犯分別被判處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古海忠之等28名偽滿政府日本戰犯則分別被判12年至28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死刑，沒有一個無期徒刑，所有被告人淚流滿面。」

### 人道判決支撐轉變 戰犯主動交自供狀

當60年後權德源再踏足瀋陽審判庭舊址，站在日本戰犯受審和謝罪的蠟像旁時，他想起戰犯古海忠之庭上的陳述：「我罪那麼大，偉大的中國人民對我寬大處理，我沒什麼可說的。」權老說，在改造和審判之前，他們是製造夢魘的「鬼」，而如今他們成為了人，這一場正義審判是宣佈他們為人的證明。

審判之後的一次偶然交談，讓權德源更明確了他們的轉變。1956年7月下旬，第二批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共340餘人坐火車赴天津坐船回國。火車駛過錦州時，一名坐在窗邊的日本軍人遠望離別的人羣，獨自低頭流淚，「你怎麼哭了？」權德源用日語與他交談，他抬起頭說「你看，前邊那小山下，原來有一個小村子，20多年前，我領日本軍人進村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他們死去回不來了，可是殺人的戰犯還活着回家，想起他們，心裡難受。」

權老相信，是中國人道主義精神和法庭嚴謹的法律工作支撐了這種轉變，「王敏求校長曾跟我說，『你看，小權，這些從廣東、浙江、上海寄來的信裡說，你們法庭的律師吃中國人的飯，為萬惡的日本戰犯辯護，你們的中國人的立場跑哪去了？』」權老認為，當時不僅是老百姓甚至有律師最開始也有這樣的疑問，他解釋到「國際法庭是必須有律師參加的規定的」。

那時，審判的結果也讓民眾生出些許疑問，「證人要求從嚴懲罰戰犯，老百姓也不理解寬大處理。」權老不避談這個話題，「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中國領導人根據國內外形勢提出和平發展，這些戰犯之前已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了6年的學習改造，很多人從抗拒改造到主動遞交自供狀，這是出於人道精神的寬大處理。」讓老人欣慰的是，這些戰犯自回國後積極投入到中日友好事業上，藤田茂回國後曾三次率由刑滿釋放的侵華戰犯組成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訪問中國，對推動1972年中日兩國建交起到了一定作用。



■瀋陽審判分為兩個階段。圖為第一階段，即1956年6月9日至19日，鈴木啓久等8名軍隊系統戰犯在法庭受審。  
翻拍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片



■1956年7月1日，瀋陽審判庭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右一）、偽滿總務廳次長王賢偉（右二）等人出庭作證。  
翻拍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片

## 辯護律師重提秘密經歷



■60年來權德源（左一）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辯護律師李長泰（中）、庭審服務人員馬鳳雲（右一）以及已故辯護律師胡金魁的兒子胡鐵生，權老與各人握手顯得十分激動。  
記者于珈琳攝

### 特稿

在上月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舉行的九一八事變8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60年來權德源首次見到了當時的辯護律師李長泰、庭審服務人員馬鳳雲以及已故辯護律師胡金魁的兒子胡鐵生。而對於在場的李長泰來說，這個秘密他守口如瓶了太久。

### 以悔罪態度好請求輕判

1956年初，從中央政法幹校東北分校畢業後留校工作的李長泰，被委派去給即將接受審判的日本戰犯當辯護律師。當時25歲的他知道，這些日本憲兵隊長，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曾親手槍殺無辜群眾、抗日志士，把抗聯戰士送到731部隊去做細菌試驗，抓勞工給日本侵略者修戰備工事……但也清醒地認識到，要

按國際法庭的要求辯護。7月13日，由他辯護的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開始受審。

「我辯護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個是他們罪行雖重，但是認罪悔罪態度好，一個是侵略政策是日本最高統治集團制定的，他們是其中的執行者，再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幾十年間，大和民族至上、侵略有理、武士道精神等教育深入人心，讓他們由人變成『鬼』。基於上述各點，請法庭考慮從輕處罰。」

「在過去的60年裡，我的這段經歷從來沒有向家人和外人說起過，我怕被誤解更不願意提起。」但重提這段被他視為秘密的經歷，「現在看是有意義的，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那些跪在中國人民面前『叩頭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就是日本侵華的鐵證。」面對近年日本右翼勢力抬頭頻仍，李長泰很憤慨。

## 正義審判為勝利也為和平

### 微觀點

瀋陽這片土地，總是能喚起濃烈的家國之情。柳條湖事變原址旁一列現代化的高鐵穿街而過，隱藏在高樓間的北大營營房舊址青磚依舊，每年接待觀衆數萬人的九一八事變歷史博物館深藏着侵略者的累累罪證……歷史的見證，不是為了記住仇恨。

正如這場距今一個甲子的瀋陽審判，中國人在國土上發出正義之聲，用法律的尊嚴和人道的力量向世界宣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沒有死刑、沒有無期徒刑，60年來人們不斷追問的答案越來越清晰——

當瀋陽審判兩年後，一封署名是戰犯宇津木孟雄的感謝信從香港寄到辯護律師李長泰的手中，向新中國表示深切感謝之餘，信中還表明歸國後定為中日友好而工作時；當1980

年，已經90歲的戰犯藤田茂彌留之際要求一定要把周總理送給他的中山裝穿身上，以示永不忘中國再生之恩，並曾在有生之年高呼「一定要把漏網的甲級戰犯岸信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祖父）拉下馬！」時；當10年前的9月18日，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立碑前85歲的日本戰犯藤原勇胸前然而，歷史的見證，不是為了記住仇恨。

人們漸覺，那一場正義而莊嚴的審判，那樣寬大而前無古人，那樣悲壯，是為勝利，更是為和平。

「我在勝利的中國人民法庭面前低頭認罪，殺一萬個藤田茂也是應該的，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真理。」日軍中將師團長藤田茂的這段話與全部45名日本戰犯近20萬頁的罪狀自供檔案將永載史冊。

## 逾千戰犯全部釋放返日本

### 話你知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移交給中國近千名日本戰犯，關押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1954年3月，根據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最高檢察院組建東北工作團，具體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偵查審訊工作，並先後赴全國12個省調查取證，查閱檔案8,000餘件，提取人證2.67萬件，訊問、調查、取證核實材料就達43.14萬頁。

195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據此，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於1956年6月至7月間，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45名戰犯。瀋陽審判分為兩個階段，6月9日至19日，對鈴木啟久等8名軍隊系統戰犯進行審判；7月1日至20日，對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進行審判。

同年，最高檢察院分三批宣佈對1,017名罪行較輕和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回國。在瀋陽和太原北審判的45名被判處有期徒刑戰犯，也在1964年3月前全部釋放回國。



■瀋陽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內復原的審判庭場景。  
記者于珈琳攝